

## ※ 研究動態 ※

# 戰後 (1945-2017) 臺灣學者對日本 《詩經》學之研究

張文朝 \*

## 一、前 言

本文所要探討的是一九四五年戰後至今（2017年），在臺灣《詩經》學研究中，臺灣學者對日本《詩經》學之研究狀況<sup>1</sup>。筆者於二〇一二年已經出版《日本における『詩經』學史》（《日本《詩經》學史》），對日本的《詩經》學史略作鳥瞰。惟遲遲未能就臺灣的《詩經》學史盡一份心力，今為此文，期能略盡棉薄。關於臺灣的《詩經》學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如林慶彰〈近十五年來經學史的研究（1972-1986）（下）〉，提出期間有五十五筆《詩經》研究的成果展現<sup>2</sup>；〈《詩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分析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九二年止之近四十年的研究概況、成果、檢討及今後研究的展望<sup>3</sup>；〈臺灣近四十年詩經學研究概況〉，該文與前文有部

\* 張文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sup>1</sup> 本文所指「臺灣學者」，以中華民國國籍為主。

<sup>2</sup> 林慶彰：〈近十五年來經學史的研究（1972-1986）（下）〉，《漢學研究通訊》第6卷第4期（1987年12月），頁185-186、189。該文指出，該時期通論經學史集中於漢、宋兩代，唐、明、清的研究偏少，各經以《易》、《書》、《詩》、《四書》為多，並建議應注意經學思想演變之研究。

<sup>3</sup> 林慶彰：〈《詩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鍾彩鈞主編：《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頁349-382。該文概況部分分上、中、下，上論先秦、兩漢、六朝隋唐，中論宋代、元明、清代、民國，下論《詩序》的作者、內容、價值、歷代學者與《詩序》的關係。成果部分則探討糜文開、裴普賢、程元敏三位學者的研究成果。檢討部分則認為：1. 研究者身分多為學生，約有五分之三的人畢業後不再從事相關研究，學非所用的現象值得深思。2. 研究者往往將研究對象孤立於時代思潮、經濟、社會和政治環境之外。3. 研究方向缺少六朝、隋唐、元明、民國等論文。展望部分則提出，今後研究《詩經》學史應注意：解

分重疊，但可互相參看<sup>4</sup>。楊晉龍〈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1949-1989)〉，該文析論臺灣學術發展的政治、教育政策、經濟因素等影響，成為促進臺灣優良、正面的學術發展契機<sup>5</sup>。林偉雄〈近四十年(1969-2007)臺灣詩經學博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概述〉，該文針對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站蒐羅出一四五篇，分成時代研究、後設研究、詩自體文本分類、主題式論文、小學研究、文本互涉比較等六類，以見臺灣《詩經》學學位論文的研究概況<sup>6</sup>。李名媛《臺灣地區一九九九至二〇一二年《詩經》學研究探論》，依周秦至明代、清代、民國以來的《詩經》學著述，分三章探討臺灣地區《詩經》學研究者的成果<sup>7</sup>。

綜觀以上的文獻，楊晉龍的〈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1949-1989)〉及

---

決歷史分期的困擾、開拓研究的新方向、凝煉新方法以補不足、點校與充實《詩經》學著作。

- <sup>4</sup> 林慶彰：〈中國臺灣近四十年詩經學研究概況〉，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7-41。又見〈臺灣近四十年詩經學研究概況〉，《文學遺產》，1994年第4期，頁119-125。如舉當時近四十年與《詩經》有關的著作研究成果，謂專書約有百餘種，論文有一千多篇，分《詩經》注釋、基本問題研究、字詞考釋、思想與技巧之探討、文獻編輯整理等數項加以探討。認為此一時期中，《詩經》學史的研究成果可能最為豐碩，約有一百餘種，其中三分之一是學位論文。此部分的成果以時代區分成先秦、兩漢、六朝隋唐、宋代、元明、清代、民國等七部分，舉出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分析。最後則提出三點檢討及三點意見，檢討之一與二，大同於前文，第三點詩篇的思想性、寫作技巧是值得再探討的方向，《詩經》學史方面則集中於漢、宋、清，其他時代則受到冷落。意見方面，則提出：1. 從資料的整理與取得著手，提高研究者研究興趣。2. 開拓中文學界師生的視野，凝煉新方法，以改善缺少變化的研究方法。3. 以存疑的態度對既有之觀念再研究分析，以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 <sup>5</sup> 楊晉龍：〈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1949-1989)〉，《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3期（2001年8月），頁28。該文透過數量統計共得685位學者，單篇論文2094篇、學士論文9篇、碩士論文93篇、博士論文15篇、專著（含論文集）143部，認為該時期《詩經》學的內容以文藝賞析、語言文字、先秦、兩漢、孔子、朱子等的研究較多，以文獻學、詩教、詩樂、六朝、五代、元代最少。研究者的層面寬、議題廣泛、資料蒐集認真、內容漸趨向精細等是特點；研究者專業精神不足、內容還有偏向、資料猶有遺漏、批評不盡客觀、方法缺乏變化等是問題所在。並指出未來的發展，除發揚特點、改進出現的問題外，必然走向開放、多元、專精、創新之途。
- <sup>6</sup> 林偉雄：〈近四十年(1969-2007)臺灣詩經學博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概述〉，《孔孟月刊》第49卷第1、2期（2010年10月），頁36-47。
- <sup>7</sup> 李名媛：《臺灣地區1999至2012年《詩經》學研究探論》（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該文對前賢研究做出較完整的成果回顧，共探討中、臺10位學者14種專著、論文，是目前最完整的介紹。本文未提及之中國學者之著作，皆可見於該文。參見該文頁2-8。

李名媛的《臺灣地區一九九九至二〇一二年《詩經》學研究探論》，於時間上已涵蓋一九四九年至二〇一二年臺灣的《詩經》學研究，頗符合戰後至今的研究範圍。就著作類別言，有專書、專書中之論文、期刊學報論文、學位論文、翻譯等。若從其中分析有無與日本《詩經》學研究的相關資料，或許就可以得知戰後臺灣學者對日本《詩經》學的研究概況。事實上，這兩種著作中的確可見一二，但是無法看出明顯成果。除此之外，迄今也未見有專文論述。因此，有必要針對此議題加以探討。為此之故，本文以闡明戰後臺灣學者對日本《詩經》學之研究為目的，採統計、歸納、分類、析論等方法，先從各資料庫、書目找出與本議題相關的論著<sup>8</sup>，統計其篇數，將之分成著作、翻譯二類，再析論各學者著作、翻譯的貢獻及影響，以見此時期臺灣學者對日本《詩經》學研究之成果。透過本研究除希望對臺灣的《詩經》學史盡一份心力外，亦期盼能提供同好研究者新知，進而深入探討日本學者的研究，以強化對日本《詩經》學之了解。以下分「戰後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成果」、「戰後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貢獻」、「戰後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影響」、「戰後臺灣學者所研究之日本學者」等四節討論，最後提出若干反省與建議以為結論。

## 二、戰後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成果

筆者由上述相關資料庫、書目，在一九四五年至二〇一七年間，找出符合本議題的論著共六十六筆。若純粹以每二十四年為一階段，這七十二年間可分成一九

<sup>8</sup> 筆者查找之目錄專書，如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一編至四編(1912-2002)（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89-2013年），共11冊。朱守亮主編：《詩經論著目錄》（臺北：洪葉文化，2000年）。村山吉廣、江口尚純合編：《詩經研究文獻目錄》（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馬輝洪、寇淑慧編著：《中國香港、臺灣地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1950-2010)》（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年）。單篇論文，如前文所述各論文。網路資料庫，包括：1.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網址：<http://nbinet.ncl.edu.tw/>，檢索日期：2017年6月12日。2. CNKI中國知網，網址：<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檢索日期：2017年6月12日。3.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網址：<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檢索日期：2017年6月12日。4.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資料庫，網址：<http://ccs.ncl.edu.tw/g0107/expertdb2.aspx>，檢索日期：2017年6月20日。5. 東洋學文獻類目，網址：<http://ruimoku.zinbun.kyoto-u.ac.jp/>，檢索日期：2017年6月20日。6.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檢索日期：2017年6月26日。

四五至一九六八、一九六九至一九九二、一九九三至二〇一七年等三時段，製成下表。由此表所呈現的情況可發現，第一時段僅有四筆論文作品，且以翻譯之作為多，有三篇。第二時段有十四筆，比第一時段增加十筆，但還是以翻譯之作居多，有十一筆，其中杜正勝翻譯白川靜(1910-2006)之著作達八筆之多。顯示此兩時段期間，臺灣學者對日本學者《詩經》之作仍處於摸索階段，故以翻譯為中介，介紹日本學者之著作給臺灣學界認識。誠如杜正勝《詩經研究·譯者自序》中說：「日人白川靜氏著《詩經研究》，我認為方法新穎，識見卓越，很值得介紹給國內對中國古典學問有興趣的朋友。」<sup>9</sup>可窺知當時的學術界尚未注意到日本學者之《詩經》學研究。第三時段共得四十九筆，成果遠遠超過前兩時段之總和的兩倍多，且著作多於翻譯，為二十九比二十，著作中專書三筆、論文二十二筆、學位論文二筆、書評二筆。翻譯中專書一筆、論文十五筆、書評三筆、訪談一筆。顯示此時段臺灣學者對日本學者《詩經》之作，已進入研究階段，提出自己的觀點。著作以張文朝為多，共十二筆，翻譯以林慶彰翻譯村山吉廣之著為多，有六筆。

就著、譯者人數而言，共有三十二人，著者十五人、譯者二十人，其中著、譯都有的三人，譯者不詳二人。名單依筆畫多寡羅列如下，括弧中的數字為篇數：王妣（譯1）、田世民（著1）<sup>10</sup>、田紆凡（著1）、呂祥竹（譯1）、杜正勝（譯9）、車行健（著2）、周富美（譯1）、林愷胤（譯1）、林葉連（著1）、林慶彰（著4、譯5）、林耀滂（著1）、金培懿（著1、譯3）、洪春音（譯1）、洪順隆（著1）、軒轅（譯1）、馬導源（譯1）、張文朝（著12）、張季琳（譯1）、張賢豹（譯1）、張寶三（著3、譯1）、莊雅州（著1）、連清吉（著1）、馮作民（著1）、馮曉庭（譯1）、黃得時（著1）、楊心怡（著1）、葉采青（譯1）、廖明飛（譯1）、廖欽彬（譯1）、盧秀滿（譯1）、譯者不詳二人。若就著、譯者身分而言，除有日語能力之外，大多為學校師生，不少有留日經驗者。這或許與政府於一九八三年起推動第二外語等政治、教育、社會、經濟因素，提高日語學習者前往日本留學有關。

<sup>9</sup> 白川靜著，杜正勝譯：《詩經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4年），自序頁1。

<sup>10</sup> 雖註田世民為1筆，此指他的專書而言，此專書中第一章與第二章都是以《詩經》學為主要論述。雖是兩章，實則由〈中井竹山的《詩經》學〉（2012年）、〈中井竹山的《詩經》學與中國《詩經》學的比較〉（2012年）、〈中井竹山《詩斷》思想探析〉（2013年）、〈中井竹山與中井履軒的《詩經》學比較〉（2013年）等論文融合而成，所以實有4筆。

根據上述，一九四五年戰後至今，臺灣學者對日本《詩經》學之研究成果，總計有六十六筆，著作的作品共三十二筆，其中專書五筆、論文二十三筆、學位論文二筆、書評二筆；翻譯三十四筆，其中專書二筆、論文二十八筆、書評三筆、訪談一筆。茲將此六十六筆論著，以出版之先後羅列如下：

1	1960年7月	馬導源譯，安藤圓秀著	關於詩經之一二考察
2	1960年7月	譯者不詳，白川靜撰	詩經蠡說
3	1964年4月	周富美譯，飯島忠夫著	書經詩經的天文曆法
4	1964年11月	黃得時	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
5	1973年1月	杜正勝譯，白川靜著	詩經研究
6	1973年2月	杜正勝譯，白川靜著	古代歌謠世界：詩經研究之二
7	1973年3月	杜正勝譯，白川靜著	山川歌謠：詩經研究之三
8	1973年5月	杜正勝譯，白川靜著	詩篇的發展及戀愛詩：詩經研究之四
9	1973年6月	杜正勝譯，白川靜著	社會與生活：詩經研究之五
10	1973年7月	杜正勝譯，白川靜著	貴族社會之繁榮與衰落：詩經研究之六
11	1973年8月	杜正勝譯，白川靜著	詩篇傳承與詩經學：詩經研究之七
12	1974年	杜正勝譯，白川靜著	詩經研究：中國古代歌謠
13	1975年6月	張賢豹譯，加藤常賢撰	所謂伊人
14	1979年1月(上)、7月(下)	洪順隆評析譯註，吉川幸次郎編選	詩經國風(上、下)
15	1980年9月	馮作民編著，白川靜原著	詩經
16	1984年8月	軒轅譯，竹內照夫著	五經的故事——詩經
17	1992年4月	譯者不詳，坂田新著	「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及其於日本的影響
18	1993年6月	林慶彰	評《詩經研究文獻目錄》
19	1994年4月	車行健	山井鼎經籍校勘的文獻憑藉——七經孟子考文與日本足利學校所藏漢籍
20	1995年3月	林慶彰譯，村山吉廣著	竟陵派的詩經學：以鍾惺的評價為中心
21	1995年6月	林慶彰譯，村山吉廣著	崔述《讀風偶識》的側面：和戴君恩《讀風臆評》的關係

22	1996年3月	林慶彰譯，村山吉廣著	《毛詩原解》序說
23	1996年3月	林慶彰譯，村山吉廣著	鍾伯敬《詩經鍾評》及其相關問題
24	1996年6月	連清吉	日本經學研究的系譜
25	1996年6月	張寶三譯（第七節以後），村山吉廣著	戴君恩《讀風臆評》與陳繼揆《讀風臆補》比較研究
26	1998年6月	張季琳譯，坂田新著	詩之序議考：關於古文復興運動的另一面
27	1999年1月	林慶彰	大田錦城和清初考證學者
28	2000年6月	盧秀滿譯，藤井良雄著	崔述《讀風偶識》的著述意圖
29	2000年6月	杜正勝譯，白川靜著	詩經的世界
30	2001年9月	林慶彰譯，村山吉廣著	姚際恆的學問（下）：關於《詩經通論》
31	2001年12月	林慶彰	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對朱子的批評
32	2002年3月	金培懿譯，江口尚純著	大田錦城之詩序論——以毛詩大序十謬為中心
33	2002年9月	馮曉庭譯，江口尚純撰	劉敞《七經小傳》略述：以《詩經小傳》的論說為例
34	2003年12月	林葉連	高田真治《詩經》初探：以〈周南〉至〈鄭風〉為範圍
35	2004年12月	張寶三	清原宣賢《毛詩抄》研究：以和《毛詩注疏》之關係為中心
36	2005年6月	金培懿譯，野間文史著	《五經正義》之研究
37	2005年8月	王廸譯，江口尚純著	江戶時期《詩經》研究的動向之一：以大田錦城為主
38	2005年12月	張寶三	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方法
39	2006年3月	洪春音譯，楠山春樹撰	《毛詩正義》所用的緯書
40	2006年6月	金培懿譯，藤井倫明錄音整理	從《五經正義》到《十三經注疏》：訪現代日本經學家野間文史教授
41	2006年12月	張文朝	太宰春臺的詩經觀
42	2006年12月	張文朝	荻生徂徠の詩經觀について
43	2007年5月	張文朝	伊藤仁齋の詩經觀について
44	2007年7月	林耀滢	葛蘭言、白川靜的《詩經》民俗學研究論述
45	2008年7月	楊心怡（指導教授：林慶彰）	太宰春臺對朱熹《詩集傳》的批評



46	2008年12月	金培懿	「義理人情」的詩教觀——江戶古學派的《詩序》觀研究
47	2009年6月	張寶三	江戶儒者東條一堂《詩經標識》研究
48	2009年6月	廖欽彬譯，佐藤進著	藤原惺窩的經解及其繼承：關於《詩經》「言」「薄言」的訓讀
49	2012年9月	張文朝	他山之石：日本近十年(2001-2010)的《詩經》學研究
50	2012年12月	張文朝	日本における『詩經』學史
51	2013年2月	張文朝	朱熹《詩集傳》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的流傳
52	2013年3月	車行健	評家井真著，陸越譯《詩經原意研究》
53	2013年10月	林慶彰	太宰春臺的中國經書古義研究
54	2014年1月	林愷胤譯，吉川幸次郎著	評松本雅明氏《關於《詩經》諸篇成立的研究》
55	2014年1月	呂祥竹譯，友枝龍太郎著	評松本雅明著《關於《詩經》諸篇成立的研究》
56	2014年1月	葉采青譯，赤塚忠著	《詩經》研究：新舊階層及其思想之發展
57	2014年3月	張文朝	渡邊蒙菴《詩傳惡石》對朱熹《詩集傳》之批判——兼論其對古文辭學派《詩經》觀之繼承
58	2014年4月	田世民	詩に興り禮に立つ：中井竹山における『詩經』學と禮學思想の研究
59	2014年5月	莊雅州	《毛詩品物圖考》述評
60	2014年6月	廖明飛譯，戶川芳郎著	毛本《十三經注疏》的九篇序：新獲《名古屋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書後
61	2015年6月	田紓凡（指導教授：林葉連）	高田真治《詩經·國風》之《詩序》研究
62	2015年9月	張文朝	仁井田好古的《詩經》觀及其對朱熹之批評
63	2015年12月	張文朝	以不錄批朱——試就〈二南〉論赤松太庾《詩經述》對朱熹《詩集傳》的無言批判
64	2016年6月	張文朝	日本江戶時期伊藤家學對朱熹《詩經》二〈南〉觀的批評

65	2016年6月	張文朝	《論語古義》中所見伊藤仁齋之《詩經》觀
66	2017年3月	張文朝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詩集傳の受容に関する研究

以下分兩節，就從事日本《詩經》學之研究、翻譯的二十二人中，依其著、譯的作品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論文參考文獻」中，被引用數量的多寡順序，析論各學者著作、評論、翻譯的貢獻及影響。

### 三、戰後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貢獻

筆者透過「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分析，得出杜正勝(105)、林慶彰(13)、張寶三(8)、林耀潏(6)、洪順隆(4)等五位學者之著、譯作品，最常被博碩士生引用<sup>11</sup>，本文據此析論他們的著作、評論、翻譯著作，以闡明他們在研究日本《詩經》學方面之貢獻。

杜正勝從一九七三年一月起至同年八月止，在《幼獅月刊》連續刊載七篇翻譯自日本學者白川靜所著《詩經研究》，更在翌年集結成一冊出版。他在《詩經研究·譯者自序》中說明了出版此書的經緯：「民國六十一年夏天，利用暑假閒暇，盡二十日之功，譯完初稿。後來把稿子交給《幼獅月刊》發表，從民國六十二年正月，按月連載，分七期刊登完畢。今年（民國六十三年）秋天，《幼獅月刊》將舊稿重新董理編排，就成這本小冊子，與大家見面。」<sup>12</sup>此即是前一節附表五至十二的翻譯之作。杜正勝認為白川靜的原書有兩大特色：「第一，作者從民俗學的觀點，嘗試將古代中國人的人生和精神點活起來。」「本書的另一特色就在釋詩基於訓詁而不以訓詁為足」<sup>13</sup>，這是杜正勝對白川靜原著解析所作的評語，舉出這二點特色，「希望借他山之石以攻自己之錯，為文史學界提供一面新鏡子」<sup>14</sup>。由此可見，這是杜正勝翻譯此書之目的，也可視之為臺灣學者研究《詩經》的貢獻。杜正勝後來

<sup>11</sup> 選擇原則乃以上述 30 名著、譯者的作品，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論文參考文獻」中，被引用篇數的多寡而定。結果，依序為正文中所提五人，括弧中的數字為引用的篇數。

<sup>12</sup> 白川靜著，杜正勝譯：《詩經研究》，自序頁 1。

<sup>13</sup> 以上二引文，見同前註，自序頁 1-2。

<sup>14</sup> 同前註，自序頁 3。



於二〇〇一年六月將此書改版而易名為《詩經的世界》，二〇〇九年增訂二版。之所以易名，杜正勝認為這是為了與原書內容切合，同時可以與白川靜的其他著作如《甲骨文的世界》、《金文的世界》吻合，故有此舉<sup>15</sup>。增訂二版中，增加了一篇長達三十二頁的〈譯者導言：詩史的開始與回歸〉，從《詩經》的歷史、《詩經》學的發展角度，介紹了以《詩經》為歷史材料的「詩史」經緯，從詩歌透視歷史，將《詩經》回歸其歷史原貌<sup>16</sup>。筆者以為這篇導言介紹了法國社會學者葛蘭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0) 的《詩經·國風》研究與民初古史辨學者對《詩》的看法之差異；白川靜的《詩經》研究方法，以及白川靜對葛蘭言的繼承與修正，還有對古史辨學者有提醒作用等等論述，都有助於吾人在研究《詩經》學時的思考，這又是杜正勝對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另一貢獻。楊晉龍也以為杜正勝翻譯此書，「對中外《詩經》學的交流亦具有重要的貢獻」<sup>17</sup>。筆者亦感認同。杜正勝對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確實有其重要的貢獻。

相對於杜正勝之翻譯，林慶彰對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貢獻，主要表現在著作、書評、翻譯三方面。首先是著作方面，林慶彰著有〈大田錦城和清初考證學者〉、〈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對朱子的批評〉、〈太宰春臺的中國經書古義研究〉等論文，茲分別介紹如下。

〈大田錦城和清初考證學者〉一文從大田錦城 (1765-1825) 《九經談》中徵引清初學者之著作，探討大田錦城與清初儒者之關係，從而澄清其著作有無剽竊之嫌疑。此文從題目上看，似乎與《詩經》學無關，其實第三節「博引清初學者之說」的第二小節「批評考據之失者」有論及大田錦城批評毛奇齡、閻若璩以《左傳》所引《詩》以論〈鄭〉、〈衛〉之詩的性質，有如「五里霧中之人」<sup>18</sup>，及第三小節「補充資料不足者」批評朱彝尊《經義考》載論《詩序》，闕漏鄭小同的《鄭志·張逸答問》，又論及大田錦城「對朱彝尊、毛奇齡未能引《海鹽縣圖經》，證明《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書之作者，感到遺憾」<sup>19</sup>。這是與《詩經》學相關之論述。

<sup>15</sup> 白川靜著，杜正勝譯：《詩經的世界》（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15年增訂二版），頁3。

<sup>16</sup> 同前註，頁11。

<sup>17</sup> 楊晉龍：〈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1949-1989）〉，頁36。

<sup>18</sup> 林慶彰：〈大田錦城和清初考證學者〉，《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上冊，頁297。

<sup>19</sup> 同前註，頁298。

最後，林慶彰提出兩點結論：（一）對大田錦城的批判僅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市井流言。且大田錦城在引清儒之說時，有些是直接引用，有些則加以批評或補正，並非單向的接納而已。（二）大田錦城〈梅本增多小辨〉的部分條目雖與王鳴盛的《尚書後案》、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結論相似，但考據的形態和資料的多寡並不一致，僅能視為暗合。且辨偽觀點有出入，字義考據為大田錦城之強項，卻是清初學者所忽略者，以此證明大田錦城無剽竊之嫌<sup>20</sup>。筆者以為此文最大貢獻，在於澄清大田錦城《九經談》並無剽竊清儒之說，除還大田錦城之清白外，亦為此學術剽竊公案畫上休止符。

〈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對朱子的批評〉，此文主要貢獻在於點出太宰氏雖著《朱氏詩傳膏肓》，欲破除朱熹《詩集傳》在《詩經》學上之權威，然而從其對朱熹之批評論點觀之，則見朱熹的《詩集傳》大抵還未達「膏肓」的程度，從而可將太宰氏之書當作反朱學代表作之一<sup>21</sup>。此文為臺灣首出之作，對其後臺灣學者相關之作，有啟迪之功，可視為此文的另一貢獻。

〈太宰春臺的中國經書古義研究〉，此文論及太宰氏《詩書古傳》、《論語古訓》、《論語古訓外傳》等，比同時期中國的陳鱣《論語古訓》、阮元的《詩書古訓》早。林慶彰用內藤湖南(1866-1934)文化擴張運動的作用與反作用說，提出周邊文化顛覆中央之說，以為日本之所以早於中國完成諸多古義經學著作，甚至形成結構完整的大學派，正是因為日本對外來文化並無包袱之故。中國則因傳統包袱沉重，須經多層轉折而失去學術先機<sup>22</sup>。筆者以為此一觀點正是該文的學術貢獻所在。

接著是書評方面，林慶彰著有〈評《詩經研究文獻目錄》〉，此文評論日本學者村山吉廣及江口尚純合編《詩經研究文獻目錄》（1992年10月）。此目錄專書中，收入不少上表所列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杜正勝的《詩經研究：中國古代歌謠》（流水編號 104668）、馮作民的《詩經》（流水編號 104669）等等專書及論文。林慶彰將此目錄專書介紹給臺灣學者認識，謂此書：「內容龐大，體例也最完

<sup>20</sup> 同前註，頁 302-303。

<sup>21</sup> 林慶彰：〈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對朱子的批評〉，《笠征教授華甲紀念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頁 204。

<sup>22</sup> 林慶彰：〈太宰春臺的中國經書古義研究〉，鍾彩鈞主編：《東亞視域中的儒學：傳統的詮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頁 449-451。

善。」<sup>23</sup>又稱「是日人編輯文獻目錄中較出色者」<sup>24</sup>，而對此書的價值，則認為：「對中國讀者來說，邦〔日〕文篇仍具有相當之參考價值。」<sup>25</sup>又說：「本《目錄》對日本學者來說，仍是檢查《詩經》文獻較容易得手的工具書。」<sup>26</sup>筆者除認同林慶彰所說之外，以為林慶彰評介此書本身已是對學界做出貢獻，更以為《詩經研究文獻目錄》是提供臺灣學者查閱日本學者研究《詩經》學的重要工具書。

最後是翻譯方面，林慶彰譯有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村山吉廣教授所著〈竟陵派的詩經學：以鍾惺的評價為中心〉、〈崔述《讀風偶識》的側面：和戴君恩《讀風臆評》的關係〉、〈《毛詩原解》序說〉、〈鍾伯敬《詩經鍾評》及其相關問題〉、〈姚際恆的學問（下）：關於《詩經通論》〉等與《詩經》學相關的論文<sup>27</sup>。由上列各論文之題名，可發現林慶彰所譯之文，多以明、清學者的《詩經》學為主要對象，可推知林慶彰有意介紹日本學者研究明、清時代《詩經》學的成果給臺灣學者認識。這與林慶彰的學術背景息息相關，正如楊晉龍所說：「明代詩經學研究實由林慶彰所帶動，……更翻譯日本學者村山吉廣探討鍾惺與郝敬詩經學研究的論文。」<sup>28</sup>可知楊晉龍對林慶彰研究明代《詩經》學貢獻的肯定。

此外，根據《林慶彰教授著作目錄：一九七五年一二〇一五年六月》，可知林慶彰手中仍有一些會議論文口頭發表的未刊稿，如〈江戶時代古學派的經書古義研究〉、〈竹添光鴻《毛詩會箋》的解經方法〉、〈臺灣研究經學史的現況(1987-1992)〉等<sup>29</sup>，可預期刊登之後，勢將對臺灣學術界帶來更大的貢獻。

<sup>23</sup> 林慶彰：〈評《詩經研究文獻目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3卷第2期（1993年6月），頁77。

<sup>24</sup> 同前註，頁81。

<sup>25</sup> 同前註。

<sup>26</sup> 同前註。

<sup>27</sup> 村山吉廣著，林慶彰譯：〈竟陵派的詩經學：以鍾惺的評價為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5卷第1期（1995年3月），頁79-92；〈崔述《讀風偶識》的側面：和戴君恩《讀風臆評》的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5卷第2期（1995年6月），頁134-144；〈《毛詩原解》序說〉，《中國書目季刊》第29卷第4期（1996年3月），頁59-64；〈鍾伯敬《詩經鍾評》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6卷第1期（1996年3月），頁127-134；〈姚際恆的學問下：關於《詩經通論》〉，林慶彰、蔣秋華編：《姚際恆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中冊，頁385-415。

<sup>28</sup> 楊晉龍：〈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1949-1989)〉，頁43。

<sup>29</sup> 〈江戶時代古學派的經書古義研究〉，首屆中國經學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2005年11月由北京清

張寶三著有〈清原宣賢《毛詩抄》研究：以和《毛詩注疏》之關係為中心〉、〈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方法〉、〈江戸儒者東條一堂《詩經標識》研究〉等論文。茲依其出版之先後，說明其對臺灣學術之貢獻如下。

〈清原宣賢《毛詩抄》研究：以和《毛詩注疏》之關係為中心〉，介紹了清原宣賢(1475-1550)之生平及其《詩經》學淵源，並提供了十種《毛詩抄》之版本。詳述了《毛詩抄》對《毛詩注疏》之承襲、補充與調整，足以提供讀者對清原宣賢《毛詩抄》的基本認識。且舉出四例探討《毛詩抄》對《毛詩注疏》之誤讀，以為：「以一外國學者而講釋中國古籍，確有其艱難之處，故宣賢屢歎經文及注、疏之難解。」<sup>30</sup>筆者以為這是張寶三對清原宣賢之歎表示同情及敬佩之意，同時提醒吾人，不管是中國古代之學者，抑或是日本有名的學者，都有可能出現疏誤之情況，切不可有照單全收之心。張寶三更認為《毛詩抄》在東亞《詩經》學史研究上，「不但具校勘之價值，且保存日本《詩經》舊解之片斷，體現日本中世《詩經》學之部分面貌，反映《毛詩注疏》在日本中世流傳之狀況等價值」<sup>31</sup>。就《詩經》學而言，這四點價值確實足以說明，清原宣賢《毛詩抄》所以至今仍為日人重視的原因所在，張寶三此文更使臺灣學者知曉日本中世《詩經》學之傳承、流傳等部分面貌。這正是張寶三此篇論文對臺灣學術的貢獻所在。

〈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方法〉，此文既以研究方法為題名，可知著重於吉川幸次郎(1904-1980)論《詩經》之研究方法。張寶三認為：「吉川幸次郎研究《詩經》，以廣搜參考資料、校勘文本、依循舊注、分析語言等為其重要方法。」更進而探究此方法之源由，認為是：「沿襲清代之考證學風，並嘗受其師狩野直喜之影響。」然而，張寶三對此法提出檢討，以為雖具有「使其所論客觀有據，並

---

華大學歷史系舉辦)。〈竹添光鴻《毛詩會箋》的解經方法〉，第五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2008年3月28、29日由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等主辦)。以上見張晏瑞、陳水福編，廖威茗增補：《林慶彰教授著作目錄：一九七五年—二〇一五年六月》(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5年)，頁39。〈臺灣研究經學史的現況(1987-1992)〉，東洋文庫講演稿(1992年由東京東洋文庫舉辦)。

<sup>30</sup> 張寶三：〈清原宣賢《毛詩抄》研究：以和《毛詩注疏》之關係為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卷第2期(2004年12月)，頁198。此文後亦收入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續探：思想文化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1-51，以及張寶三：《東亞詩經學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329-381。

<sup>31</sup> 張寶三：〈清原宣賢《毛詩抄》研究：以和《毛詩注疏》之關係為中心〉，頁160。

能重視《詩經》語言中所具之美感」等優點，卻也有「解《詩》多依循舊注而少創新，又鮮少利用清代以後中、日學者之研究成果，故所解未免流於過度保守之弊」<sup>32</sup>等缺失。此文以清晰易解之筆，為讀者析論了吉川幸次郎研究《詩經》的方法及其優劣，可說是其重要的貢獻。

〈江戶儒者東條一堂《詩經標識》研究〉，此文指出東條一堂(1778-1857)之《詩經標識》乃以朱熹《詩集傳》為文本所作之備忘札記，「或從或駁，或引他書以為參照，多針對朱《傳》而發」<sup>33</sup>。後由門人鈔錄成書，但遲至昭和三十年始有刊行本。書中引日本學者之著，只有太宰春臺之《朱氏詩傳膏肓》，中國學者之著則以毛《傳》、鄭《箋》、朱熹《詩集傳》、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為多。張寶三認為東條一堂《詩經標識》也許較早完成，所以引清人著作較少，只有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毛奇齡《毛詩寫官記》、姚際恆《古今偽書考》而已<sup>34</sup>。並指出東條一堂有「《詩》亦寓言」、「便韻」、「興意本淺」等《詩經》觀，其解《詩》已有乾、嘉考證學之風格。雖引毛《傳》、鄭《箋》之說，以正朱《傳》之非，然不對毛、鄭之說一味曲從，表現出「折衷派」之學風。張寶三認為：「研究東條一堂《詩經標識》，可增進對江戶後期《詩經》學之瞭解，以作為未來進一步研究日本《詩經》學史之參考。」<sup>35</sup>張寶三此文，提供讀者理解東條一堂《詩經標識》之性質，及其受太宰春臺之影響，為學態度不偏古新注，而有「折衷派」之學風。這是此文之貢獻所在。

從張寶三所研究的人物生存時代來看，清原宣賢屬於中世室町後期的學者，東條一堂屬於近世江戶後期的學者，吉川幸次郎則是近現代的學者。筆者不知張寶三是否有意要將這三個連續的時代串連起來研究，不過，就這三篇的研究對象而言，確有此傾向。由此三篇可看出張寶三研究日本學者《詩經》學的梗概，如：(一)介紹日本學者的生平、著作、版本，以為知人論世。這點在研究不太為人所知的古代學者或外國學者時，特別重要，可以讓不熟悉該人物的臺灣學者對研究對象獲得

<sup>32</sup> 以上四引文，見於張寶三：〈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方法〉，《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2卷第2期(2005年12月)，頁48。

<sup>33</sup> 張寶三：〈江戶儒者東條一堂《詩經標識》研究〉，葉國良，徐興慶編：《江戶時代日本漢學研究諸面向：思想文化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50。

<sup>34</sup> 同前註。

<sup>35</sup> 同前註，頁118-119。



初步的理解。(二)提綱挈領地論述該學者的注經、解經方法、特色。(三)得以檢討其注經、解經的得失，以為參考。此種研究方法可以掌握到研究對象的核心問題，不至於有所游離。

張寶三又譯有村山吉廣〈戴君恩《讀風臆評》與陳繼揆《讀風臆補》比較研究〉一文之部分，收於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此文前六節分析了戴君恩《讀風臆評》的體例、內容、特點，及戴君恩說《詩》的立場、對《讀風臆評》的評價。第七節以下分析了《讀風臆補》的體例、陳繼揆的寫作動機、陳繼揆小傳、《讀風臆評》與《讀風臆補》二書的比較。此文提供了兩書的體例、寫作立場與動機，指出《讀風臆評》之特點在於：反朱熹以人智說《詩》，主張以一己之「臆」說《詩》。對《讀風臆評》之評價，以為對《詩經》文學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對崔述的《詩經》學有很大的影響。指出《讀風臆補》的特質在於：「將《詩經》從經書中分離出來，徹底將它視為中國詩歌史的原點、源流，明確地給予定位。」<sup>36</sup>可知原作者將民國以來《詩經》文學化的起源往前溯至陳繼揆《讀風臆補》，張寶三等使臺灣學者認識此文，正是譯者之貢獻所在。

林耀潏關於《詩經》學的著作，專書有《先秦儒家詩教研究》(1990)、《西漢三家詩學研究》(1996)、《詩經休閒詩的倫理意涵與民俗意涵》(2014)等，單篇論文約有三十篇。其中與日本《詩經》學有關的，筆者目前只收集到一篇，即〈葛蘭言、白川靜的《詩經》民俗學研究論述〉，此文發表於《成大中文學報》(2007年7月)，主要論述法國社會學者葛蘭言與日本學者白川靜，以民俗學研究《詩經》的研究方法、內涵、貢獻、缺失。此文先簡介葛蘭言、白川靜生平與著述，謂兩人的《詩經》研究「就是一種文化人類學(民俗學)進路的研究，試圖復原《詩經》國風歌謠的『本來面目』」<sup>37</sup>。接著以「反對象徵主義的解釋」、「社會分析法與比較法的《詩經》詮釋」、「《詩經》中的情歌之節慶儀式意義」等三小節論述葛蘭言的《詩經》民俗學研究，以為葛蘭言反對以政治、道德、儀式、歷史等象徵主義解釋《詩經》，指出葛蘭言的研究方法即是社會學的分析法與比較法；他選擇富有

<sup>36</sup> 村山吉廣著，張寶三譯：〈戴君恩《讀風臆評》與陳繼揆《讀風臆補》比較研究〉，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頁366。

<sup>37</sup> 林耀潏：〈葛蘭言、白川靜的《詩經》民俗學研究論述〉，《成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7年7月)，頁50。



宗教性或神話性的史料作為研究對象，更透過在節慶中歌詠的即興創作情歌，得知以此為古代性愛儀禮活動，與道德、美刺諷諭無關。林耀滂認為：「葛蘭言的這種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進路，為《詩經》學研究開啟了無數的新視窗。」<sup>38</sup> 筆者也認同林耀滂的評論。相對於葛蘭言的《詩經》研究方法，林耀滂又以「反對故事化解釋學」、「民俗學方法與比較法的《詩經》詮釋」、「《詩經》與《萬葉集》的比較」等三小節論述白川靜的《詩經》民俗學研究；認為白川靜稱毛、鄭以下之《詩經》研究為「故事化解釋學」而加以反對，選取與中國古代歷史相近的《萬葉集》時代作為民俗學比較之對象，認為中國之「招魂續魄」與日本之「振魂」、「鎮魂」是形成古代歌謠世界的起源。林耀滂認為白川靜有見乎原始氏族社會中的人類，一切活動中無不蘊含民俗的符碼，解開了傳統《詩經》學者勘不破的原始文化密碼<sup>39</sup>。最後，林耀滂舉二者《詩經》民俗學研究的得失，認為兩者之得「在由口傳文學過渡到書面文學的那些國風詩篇中，其詮釋最有效」。其失則在於「他們的研究進路，無法詮釋全部的詩篇」。最後，林耀滂對兩者的研究方法做出評論：「他們的研究視角，做為一種新方法論，對《詩經》研究的整體而言，是不可或缺的。」<sup>40</sup> 筆者以為這正是林耀滂此文之貢獻所在。

洪順隆評析譯註吉川幸次郎編選《詩經國風》上、下冊(1979)，洪順隆在「序言：五、我的改寫」中提到：「我編這本書，大體依吉川幸次郎博士的體例，……凡原著中，為日本讀者闡釋之語，以及各詩韻腳之釋，皆予省略。每詩又增評析一欄，以助讀者品賞。」<sup>41</sup> 如依此言，則可知洪順隆對原著有刪有增，當是費了一番功夫。可惜如楊晉龍所言，這書「似未受到重視」<sup>42</sup>。不過，就在楊晉龍為其發聲之後，翌年，即有研究生關注到此書而加以引用。此書編寫之初，完全是為了響應政府推動文藝復興，替文化復興工作盡責，並藉此推動古典文學的普遍化、通俗化所做的努力<sup>43</sup>。因此，或可視為是此書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的貢獻。至於對今日的吾輩

<sup>38</sup> 同前註，頁 55。

<sup>39</sup> 同前註，頁 71-72。

<sup>40</sup> 以上三引文皆見同前註，頁 77。

<sup>41</sup> 洪順隆評析譯註，吉川幸次郎編選：《詩經國風》（臺北：林白出版社，1979 年），頁 22。

<sup>42</sup> 楊晉龍：〈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1949-1989）〉，頁 39。

<sup>43</sup> 洪順隆評析譯註，吉川幸次郎編選：《詩經國風》，總序頁 8。

而言，此書介紹了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編選《詩經國風》的註解方法<sup>44</sup>，實可增進臺灣學者對吉川幸次郎《詩經》學的了解。洪順隆提到以民俗學解釋古典的著作，成績雖然可觀，但是吉川幸次郎認為此說未成體系，所以不採用民俗學的方法。此則提供吾人另一種研究《詩經》的進路思考取向，亦可視為此譯書之貢獻。

審視上述五位前輩對臺灣《詩經》學的貢獻，主要以翻譯作品較為亮眼。就外國著作在異地傳播的角度而言，翻譯的手段當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畢竟並非全臺灣的《詩經》學者都能閱讀外文（任何一外國的語文）。因此，透過翻譯的介紹，實有其必要性。而此五位前輩的貢獻，也正是基於有心翻譯、推介日本《詩經》學研究給廣大的臺灣《詩經》學研究者認識之故。可以說，如果沒有前輩們的翻譯工作，臺灣對日本《詩經》學的研究將會大為失色。

另外，田世民、林葉連、金培懿、洪春音、張文朝、馮作民、馮曉庭、楊心怡（以上各被引用2次）、黃得時（被引用1次）等臺灣學者也分別為戰後研究日本《詩經》學做出各自的貢獻。

#### 四、戰後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影響

本節承上所論五位學者的著、譯成果，析論他們對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影響。本節所謂「影響」是指五位著、譯之作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論文參考文獻」中，被引用的情況而言，以所呈現的數量多寡為依據，以見其對學位論文的影響。

杜正勝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論文參考文獻」中，被引用的總筆數為一九一八筆，而與日本《詩經》學之研究相關的著、譯作，被引用的總筆數為一〇五筆。其中，二〇〇一年改版的《詩經的世界》有七十四筆，原版的《詩經研究：中國古代歌謠》也有三十一筆。此書雖是翻譯之作，卻是影響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的重要譯作。以一〇五篇學位論文引用此書的紀錄來看，即可想像其廣為學子青睞之程度。再就此書的出版情況來說，自從一九七四年以書名《詩經研究》在幼獅文化出版後，一九七五年再版、一九七八年再版二刷、一九八二年三版。改版的《詩經的世界》自二〇〇〇年在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後，二〇〇一年、

<sup>44</sup> 即「儘量避免鑿空立說，憑胸臆推測，以逞新義」。見同前註，頁19-21。

二〇〇二年都有再刷，至二〇〇九年增訂二版。由此可見，此書出版量不容小覷，受重視的情況及其影響，自然不言可喻了。由於杜正勝的譯書，引用者太多，所以本文僅就學位論文及期刊論文各舉一例，以見此書之影響。如田紓凡在其論文《高田真治《詩經·國風》之《詩序》研究》中，論及白川靜的《詩經》學時，說：「在白川靜的《詩經的世界》裏，則是將《詩經》與日本的古老的作品《萬葉集》做出比較，藉此來闡述其對於《詩經》的看法與見解，白川氏並不拘於《詩序》的解釋，而是認為各種民歌與當地的風俗、社會生活與宗教有相當程度相關，甚至這些詩歌也是因應當地的不同的祭祀方式所形成。」<sup>45</sup> 田紓凡在文中所舉《詩經的世界》之書名，正是杜正勝所譯之書。另外，林耀潏著〈葛蘭言、白川靜的《詩經》民俗學研究論述〉，全文多處引用杜正勝所譯《詩經的世界》之言<sup>46</sup>。趙桂芬著〈吳歌西曲的女性書寫特徵〉文中，論及男女互相投花贈果以表情達意時，即引杜正勝所譯《詩經研究》（1982年版，頁129）之言，以為「此一風尚，代代相沿成習」<sup>47</sup>。以上雖僅各舉引用杜正勝譯書之一例，亦可窺見其影響於一斑。

林慶彰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論文參考文獻」中，被引用的總筆數為一二七〇筆，而與日本《詩經》學之研究的相關著、譯作，被引用的總筆數為十三筆。其中，林慶彰著〈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對朱子的批評〉被一篇引用，即楊心怡所撰《太宰春臺對朱熹《詩集傳》的批評》（2008），楊心怡之論文認為林慶彰之文：「此一初步系統化的整理，開創了國內具前瞻性的域外漢學研究新視野，可以說是對日本《詩經》學研究有能察人之所未察的引導作用。而筆者正是在此基礎上，得以將太宰氏的重要《詩經》學著作《朱氏詩傳膏肓》作進一步的探討，並更細緻的剖析其批判特點與內外緣由，俾其經學詮釋理論能更臻完備的呈現。」<sup>48</sup> 由此敘述可知林慶彰此文之影響。正如楊心怡所說，林慶彰此文具有「引導作用」，後來的張文朝〈太宰春臺的詩經觀〉（2006）、金培懿〈「義理人情」的詩教

<sup>45</sup> 田紓凡：《高田真治《詩經·國風》之《詩序》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頁16。

<sup>46</sup> 林耀潏：〈葛蘭言、白川靜的《詩經》民俗學研究論述〉，頁43-78。

<sup>47</sup> 趙桂芬：〈吳歌西曲的女性書寫特徵〉，《東海中文學報》第20期（2008年7月），頁115。

<sup>48</sup> 楊心怡：《太宰春臺對朱熹《詩集傳》的批評》（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緒論頁7。

觀：江戶古學派的《詩序》觀研究》(2008)等論文，都是沿襲此文而寫<sup>49</sup>。

林慶彰譯，村山吉廣著《毛詩原解》序說》有二篇引用，即張曉生撰《郝敬及其四書學研究》、田紓凡撰《高田真治《詩經·國風》之《詩序》研究》。張曉生之論文，在論及「近代以來，日本學者曾有多人從事郝敬的研究，但關注焦點集中在其重氣的思想及《詩經》、《春秋》學著作」時，於註腳介紹此譯文<sup>50</sup>。另外，蔣秋華著《郝敬的詩經學》在論郝敬《毛詩原解》的主要立論時，也推介了林慶彰此篇譯文<sup>51</sup>。

林慶彰譯，村山吉廣著《崔述《讀風偶識》的側面：和戴君恩《讀風臆評》的關係》有二篇引用，即張淑惠撰《鍾惺的詩經學》、侯美珍撰《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張淑惠之論文，論鍾惺《詩》學的影響時，引此譯文，謂崔述「其著作《讀風偶識》即以戴君恩《讀風臆評》為研究對象，雖然在形式上不是採用評點方式，但在精神上繼承了晚明《詩》學文學欣賞的經驗，不取一切舊注、舊解，而從虛心探究詩意開始，亦知其《詩》學傾向鍾惺竟陵一派」<sup>52</sup>。侯美珍之論文在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現況做檢討時，提及林慶彰此篇譯文<sup>53</sup>。另外，黃忠慎著《以史觀詩，以詩興史：崔述《讀風偶識》析評》，於註腳處論及林慶彰此一譯作：「以為《讀風臆評》一書刺激了崔述作《讀風偶識》的動機，《讀風臆評》以自由的詩解作為目的，不重視訓詁，又以文學評論的方式解詩，不關經義，這兩點都影響了崔述，又說崔述開啓了方玉潤以『欣賞奇文』的文藝批評鑑賞態度。」<sup>54</sup>又，黃忠慎著《傳統與變異：論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解《詩》基調》，在註腳處舉出「以為姚際恆從文學角度說《詩》」時，亦列有林慶彰此一譯作<sup>55</sup>。

<sup>49</sup> 張文朝：〈太宰春臺的詩經觀〉，《經學研究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年），第14輯，頁151-184。金培懿：〈「義理人情」的詩教觀——江戶古學派的《詩序》觀研究〉，《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5卷第2期（2008年12月），頁173-210。

<sup>50</sup> 張曉生：《郝敬及其四書學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年），頁9。

<sup>51</sup> 蔣秋華：《郝敬的詩經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2期（1998年3月），頁270-271。

<sup>52</sup> 張淑惠：《鍾惺的詩經學》（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頁153。

<sup>53</sup> 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頁12。

<sup>54</sup> 黃忠慎：〈以史觀詩，以詩興史：崔述《讀風偶識》析評〉，《漢學研究》第29卷第1期（2001年3月），頁228。

<sup>55</sup> 黃忠慎：〈傳統與變異：論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解《詩》基調〉，《東海中文學報》第21期

林慶彰譯，村山吉廣著〈竟陵派的詩經學：以鍾惺的評價為中心〉有六篇引用，分別是蕭開元撰《晚明學者的《詩序》觀》、張淑惠撰《鍾惺的詩經學》、侯美珍撰《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許璧如撰《鍾惺詩學理論研究》、江翊君撰《鍾惺、譚元春詩論研究：以《詩歸》為核心的探討》、伍純嫻撰《明代《詩經》專著與《詩傳大全》關係之研究》。蕭開元之論文，在註腳處論及「後代學者在討論明代《詩經》學時所經常提到的晚明《詩經》著作」時，提及林慶彰此譯文<sup>56</sup>。張淑惠之論文，在論鍾惺之學未被官方列入書目，引此譯文，謂：「由於沒有被著錄，當然不可能歸納為一個派別了。」<sup>57</sup>又在論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時，除提供藏於國家圖書館（1種）、九州大學（1種）、美國國會圖書館（2種）外，引此譯文，謂：「藏於日本內閣文庫之《鍾伯敬評點詩經》來因堂藏版與《詩經鍾評》杞堂藏版二種。」<sup>58</sup>侯美珍之論文，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的研究現況進行檢討，關於研究鍾惺《詩經》評點的相關論文時，提及林慶彰此譯文<sup>59</sup>。伍純嫻之論文，謂：「近年來日本學者村山吉廣先生與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林慶彰先生、蔣秋華先生、楊晉龍先生以及大陸學者劉毓慶先生均對明代《詩經》學的相關研究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特別是楊晉龍先生的《明代詩經學研究》一書……對於明代《詩經》學的相關後續研究訂定了非常札實的根基。」<sup>60</sup>論文中雖無明文提及此譯文，但於文獻參考處有列出。所以，伍純嫻所參考的村山吉廣的明代相關著作，或許是指此篇而言。由此，亦可見林慶彰此譯文之影響。

林慶彰譯，村山吉廣著〈鍾伯敬《詩經鍾評》及其相關問題〉有二篇引用，即張淑惠撰《鍾惺的詩經學》、侯美珍撰《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侯美珍之論文在關於研究鍾惺《詩經》評點的相關論文時，提及林慶彰此譯文<sup>61</sup>。

綜觀以上所述，林慶彰先見之明，從日本《詩經》學者的研究中，引進不同以

---

（2009年7月），頁54。

<sup>56</sup> 蕭開元：《晚明學者的《詩序》觀》（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頁14。

<sup>57</sup> 張淑惠：《鍾惺的詩經學》，頁4。

<sup>58</sup> 同前註，頁108-109。

<sup>59</sup> 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頁13。

<sup>60</sup> 伍純嫻：《明代《詩經》專著與《詩傳大全》關係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頁17。

<sup>61</sup> 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頁13。



往的新觀點、新視野，為臺灣《詩經》學史開拓新議題。同時，也為臺灣學者打開研究日本《詩經》學史的新視窗，其影響綿綿不絕。

張寶三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論文參考文獻」中，被引用的總筆數為一三六筆，與日本《詩經》學研究相關的著、譯作，被引用的總筆數為八筆。其中，張寶三譯，村山吉廣著〈戴君恩《讀風臆評》與陳繼揆《讀風臆補》比較研究〉有二篇引用，即侯美珍撰《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王嘉慧撰《沈守正《詩經說通》研究》。侯美珍在關於研究戴君恩《詩經》評點的研究論文中，提及張寶三此譯文<sup>62</sup>。王嘉慧之論文，在論述關於明代整體的《詩經》學研究的單篇論文時，舉張寶三此譯文為例<sup>63</sup>。

張寶三著〈清原宣賢《毛詩抄》研究：以和《毛詩注疏》之關係為中心〉有四篇引用，即張惠娟撰《鄭玄《毛詩譜》研究》、楊心怡撰《太宰春臺對朱熹《詩集傳》的批評》、游鎮壕撰《王韜《毛詩集釋》引陳奐《詩毛氏傳疏》研究》、李名媛撰《臺灣地區一九九九至二〇一二年《詩經》學研究探論》。楊心怡在論述朱熹《詩集傳》東傳日本，對清原宣賢撰《毛詩抄》起影響作用時，即在註腳處介紹張寶三此文，引導讀者再深入參考<sup>64</sup>。游鎮壕指出王韜《毛詩集釋》若依張寶三之定義應是屬於「單疏體」，並於註腳處舉張寶三此文中說清原宣賢《毛詩抄》「在形式上乃採用『單疏體』」<sup>65</sup>。李名媛謂：「根據張氏所考察，《毛詩抄》釋《詩》大抵依《毛傳》、鄭《箋》、孔《疏》之說為主體，再透過中國宋、元、明之注疏補充。清原氏在訓釋時，對〈小雅·采芣〉、〈鄭風·將仲子〉、〈陳風·東門之池〉與〈秦風·車鄰〉等篇章之詞義偶有誤解。《毛詩抄》因有『古本』、『家本』等等保留早期版本的面貌者，有助於《詩經》的校勘，又保存了日本《詩經》舊有解釋，得以明瞭日本中世以前對《詩經》的解釋，且《毛詩抄》大抵依據《毛詩注疏》而解

<sup>62</sup> 同前註，頁 12。

<sup>63</sup> 王嘉慧：《沈守正《詩經說通》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頁 1-2。另外，王嘉慧之〈窮則變，變則通：沈守正《詩經說通》之《詩》學評析研究〉在探討關於明代整體《詩經》學研究時，亦舉張寶三此譯文。見王嘉慧：〈窮則變，變則通：沈守正《詩經說通》之《詩》學評析研究〉，《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23 期（2013 年 9 月），頁 52-53。

<sup>64</sup> 楊心怡：《太宰春臺對朱熹《詩集傳》的批評》，緒論頁 40-41。

<sup>65</sup> 游鎮壕：《王韜《毛詩集釋》引陳奐《詩毛氏傳疏》研究》（新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古典文獻組碩士論文，2014 年），頁 23。



釋，雖有引述宋、元、明代的經學家著作，卻有主、從關係，並非漢、宋兼採的立場，可反映出《毛詩注疏》在日本當時的重要性。」<sup>66</sup>可說已道出張寶三此文之重點。

張寶三著〈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方法〉有二篇引用，即洪博昇撰《段玉裁之《尚書》學》、李名媛撰《臺灣地區一九九九至二〇一二年《詩經》學研究探論》。洪博昇在結語處論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時，引張寶三之文：「日人吉川幸次郎亦自云其治學過程：『對我助益最多者為段玉裁，尤其是其所撰之《古文尚書撰異》。』」而謂：「可見前人對《撰異》的評價多予讚賞。」<sup>67</sup>李名媛謂此文：「分析吉川氏的《詩經》學著作，闡釋吉川氏《詩經》研究成果的特色，並藉以反映現代日本《詩經》學的現況。在進行《詩經》研究前，吉川氏先廣蒐資料、校勘文本，以確保研究的準確性。探討《詩經》文本時，多依從舊注以解《詩》，此為吉川氏《詩經》研究的優點，卻也是其過度保守的缺失所在。」<sup>68</sup>此分析可說中肯地點出張寶三論文的重點。

林耀潏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論文參考文獻」中，被引用的總筆數為九十八筆，與日本《詩經》學研究相關的著、譯作，被引用的總筆數為六筆。此六篇全是引用林耀潏著〈葛蘭言、白川靜的《詩經》民俗學研究論述〉一文，即沈文珍撰《《詩經》女性角色及其婚姻研究》、張惠婷撰《錢鍾書的《詩經》研究探析》、許瑞誠撰《聞一多《詩經》詮釋研究》、邱鈺倫撰《對人的挑戰：《詩經》中的焦慮》、葉巧藜撰《《詩經》中養生意識研究》、田紓凡撰《高田真治《詩經·國風》之《詩序》研究》。另外，陳淑萍著〈伽達默爾的遊戲、模仿在文學經典詮釋之運用：以《詩經》為例〉的結語中，謂：「伽達默爾的遊戲概念帶引出來的文本詮釋理論，讓當代學者不囿於傳統見解，勇於用全新視野開創研究命題。林耀潏師以接受美學理論研究《上博簡·孔子詩論》，法國現代社會學派大師葛蘭言、日本學者白川靜拋棄傳統美刺之說，以文化人類學角度詮釋《詩經》，在伽達默爾看來，都是極其樂見之事。」<sup>69</sup>所謂葛蘭言、白川靜之事，即是引林耀潏

<sup>66</sup> 李名媛：《臺灣地區 1999 至 2012 年《詩經》學研究探論》，頁 113。

<sup>67</sup> 洪博昇：《段玉裁之《尚書》學》（臺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179。

<sup>68</sup> 李名媛：《臺灣地區 1999 至 2012 年《詩經》學研究探論》，頁 113。

<sup>69</sup> 陳淑萍：〈伽達默爾的遊戲、模仿在文學經典詮釋之運用：以《詩經》為例〉，《有鳳初鳴年刊》第 8 期（2012 年 7 月），頁 454。

此文而言。

洪順隆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論文參考文獻」中，被引用的總筆數為六四八筆，與日本《詩經》學研究相關的著、譯作，被引用的總筆數為四筆。這四筆全是洪順隆譯，吉川幸次郎編選《詩經國風》（上、下），即陳秀英撰《十五〈國風〉作者身分探究》、林純玉撰《〈詩經〉中射事研究》、蔡豐安撰《林宗源臺語詩的性和愛》、許雯怡撰《〈詩經·鄭風〉研究》。陳秀英在論婦女時，舉〈衛·氓〉之詩，引洪順隆此譯著，謂：「此當是棄婦自傷之詩，且此棄婦可推知貴族階級也。」<sup>70</sup> 足見此書之影響。

以上分兩節論述五位學者的貢獻及其影響。五位學者是臺灣學術界的前輩級人物，他們的貢獻及影響之大，早為眾人所周知；年輕輩學者，如田世民、田紓凡、車行健、金培懿、馮曉庭、楊心怡等都有相關著作，研究日本《詩經》學之貢獻及影響，假以時日，或當有耀眼之成績<sup>71</sup>。

## 五、戰後臺灣學者所研究之日本學者

根據前表所列著、譯作品，戰後臺灣學者研究之日本學者約有三十二位。若以時代區分，則室町時代一人、江戶時代十二人、近現代十九人，顯示臺灣學者以研究近現代的日本學者為多。江戶時代的日本學者中，古學派學者居七人之多，說明臺灣學者對江戶時代古學派學者的《詩經》研究成果有較高的興趣。最受臺灣學者關注的是江戶時代的太宰春臺、大田錦城，以及近現代的白川靜、吉川幸次郎、村山吉廣、江口尚純等人。

如上所述，臺灣學者研究太宰春臺的《詩經》學，大部分都受林慶彰的影響。太宰春臺乃古文辭學派創始人荻生徂徠的高足，經學著作等身。林慶彰從明代中葉的復古學術風潮中，思考與此時期相近的日本學術界，同樣掀起一股反朱子學的熱潮，他由此切入，論述江戶時代在經學上用功甚深的太宰春臺。太宰春臺的著作雖多，但是國人大多不知其人，認為如能從其所著《朱氏詩傳膏肓》入手研究，「一

<sup>70</sup> 陳秀英：《十五〈國風〉作者身分探究》（新竹：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122。

<sup>71</sup> 囿於篇幅，除已論述的五位學者外，其他學者無法一一詳論其貢獻與影響，他日另文再述。

方面可以充分了解太宰氏批評朱子的緣由；另一方面也可得知在海外批判朱子的思潮幾乎是與中國同步流行的」<sup>72</sup>。正因為太宰春臺在經學研究上有其一定的成果，所以林慶彰才選擇研究他的《詩經》學，進而帶動臺灣學者的跟進。

臺灣學者注意到大田錦城的《詩經》學，主要也是因為林慶彰於一九九九年一月發表一篇〈大田錦城和清初考證學者〉後，相繼有二〇〇二年三月金培懿所譯的〈大田錦城之詩序論：以毛詩大序十謬為中心〉及二〇〇五年八月王廸所譯的〈江戶時期《詩經》研究的動向之一：以大田錦城為主〉。大田錦城為江戶時期集考證學之大成的學者，考據之目的乃在於明義理，這是大田錦城為學的特色。如上所述，林慶彰謂大田氏之強項在於字義的考據，這正可說明，大田氏字義的考據在於明義理。

從洪順隆的評析譯注、張寶三的論著，可知吉川幸次郎治學受狩野直喜、段玉裁之影響至深，雖置身於當時新學問、新方法的學術風潮中，仍堅信研究《詩經》應以傳統《詩經》學研究為方法，不應冒然採用民俗學的新方法。

白川靜則與吉川幸次郎相反，他的《詩經》研究方法採用透過甲骨文與金文的研究及利用民俗學，理解產生《詩經》的社會、文化等時代背景<sup>73</sup>。白川靜在一九六〇年寫成《稿本詩經研究：通論篇》及《稿本詩經研究：解釋篇》、《「興」的研究》，前者作為博士班講義，後二者作為碩士班的講義。臺灣介紹白川靜《詩經》學的是杜正勝與馮作民。兩位學者介紹的都是《詩經：中國的古代歌謠》，此書乃由中央公論社根據《稿本詩經研究：解釋篇》於一九七〇年出版。在臺灣除該書外，另一本不見有人研究或翻譯。

臺灣所見村山吉廣的論文，大部分是透過林慶彰的翻譯介紹而認識。目前所見六篇翻譯中，就有五篇由林慶彰翻譯，即可說明此事實。這六篇村山吉廣的原著，都以明、清時代的學者為研究對象，如明代的郝敬(1558-1639)、戴君恩、鍾惺，清代的崔述、姚際恆、陳繼揆等《詩經》學研究者。除上述論文外，村山吉廣另有：〈方玉潤の詩經學：『詩經原始』の特質〉(1989)、〈近時詩經學の諸問題〉(2008)、〈周南「麟之趾」小解〉、〈召南「小星」小解〉(2014)、〈邶風「二子乘舟」

<sup>72</sup> 林慶彰：〈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對朱子的批評〉，頁 187-188。

<sup>73</sup> 山田統：〈白川靜著《稿本詩經研究》：通論編・解釋編〉，《東洋學報》第 44 卷第 3 號（1961 年 12 月），頁 413。

小解》(2015)等單篇論文，且於二〇〇五年出版專書《詩經の鑑賞》<sup>74</sup>。然而到目前為止，臺灣學界似乎還沒有出現專文探討村山吉廣的《詩經》學研究，除林慶彰、張寶三外，也不見有人為之翻譯。

江口尚純關於《詩經》研究的相關論文，在臺灣學界可見到的僅有大田錦城的研究，雖然另有北宋劉敞(1019-1068)的《詩經》學，但僅一篇而已。其實，江口尚純關於《詩經》研究的論文約有三十餘篇，可分為中國唐宋《詩經》學、日本江戶時代的《詩經》學、《詩經》學的目錄學等三個領域。中國唐宋《詩經》學方面的議題，涉及到劉敞、王安石(1021-1086)、蘇轍(1039-1112)、晁說之(1059-1129)、鄭樵(1104-1162)、段昌武、王質(1135-1189)等人的《詩經》學。日本江戶時代的《詩經》學方面，則涉及林鷺峯(1618-1680)、大田錦城、岡井赤城(?-1803)、伊藤東所(1730-1804)、齋藤芝山(1743-1809)、增島蘭園(1769-1839)等人的《詩經》學。《詩經》學的目錄學方面，又分為中文篇與邦文篇，之後，與村山吉廣於一九九二年集結出版《詩經研究文獻目錄》。往後，江口尚純幾乎每年都有單篇之編輯發表於雜誌、學報，提供有心了解現代日本《詩經》學的研究者最新的研究資訊，其功不可沒。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發現一件事實，即臺灣學者對日本學者的《詩經》學研究，情況仍有待強化，不少日本學者優秀的《詩經》學著作無人翻譯或研究，就研究日本《詩經》學史而言，這是一大缺口。以江戶時代的《詩經》相關作者來說，至少也有二六〇人，但是經本文的研究，竟然只有十一人被臺灣學者研究，可見就個別學者的研究而言，仍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江戶時代的《詩經》相關書籍至少也有四二〇種，同樣的也很少被現代學者研究，這也是可以再努力的範疇。近現代的《詩經》學相關著作至少有一五七六種，但只有二十四種為臺灣學者所研究，實在不成比例，這也成為亟需追趕的領域。

<sup>74</sup> 村山吉廣：〈方玉潤の詩經學：『詩經原始』の特質〉，《日本中國學會報》第41號（1989年），頁198-206；《詩經の鑑賞》（東京：二玄社，2005年）；〈近時詩經學の諸問題〉，《國學院中國學會報》第54號（2008年12月），頁1-10；〈周南「麟之趾」小解〉，《詩經研究》第34號（2012年12月），頁8-10；〈召南「小星」小解〉，《詩經研究》第36號（2014年12月），頁33-35；〈邶風「二子乘舟」小解〉，《詩經研究》第37號（2015年12月），頁35-37。

茲將本節所述學者，依其生存時代分為室町時代、江戶時代與近現代，表列如下：

時代	學者姓名	篇數／人次	生卒年
室町	清原宣賢	1/1	1475-1550
江戶	藤原惺窩	1/1	1561-1619
	伊藤仁齋	2/1	1627-1705
	荻生徂徠	1/1	1666-1728
	太宰春臺	4/3	1680-1747
	渡邊蒙菴	1/1	1687-1775
	山井 鼎	2/2	1690-1728
	赤松太庾	1/1	1709-1767
	中井竹山	1/1	1730-1804
	岡 元鳳	1/1	1737-1786
	大田錦城	3/3	1765-1825
	仁井田好古	1/1	1770-1848
東條一堂	1/1	1778-1857	
近現代	飯島忠夫	1/1	1875-1954
	安藤圓秀	1/1	1885-1946
	高田真治	2/2	1893-1975
	加藤常賢	1/1	1894-1979
	吉川幸次郎	3/3	1904-1980
	竹內照夫	1/1	1910-1982
	白川 靜	12/4	1910-2006
	松本雅明	2/2	1912-1993
	赤塚 忠	1/1	1913-1983
	友枝龍太郎	1/1	1916-
	楠山春樹	1/1	1922-2011
	村山吉廣	6/2	1929-
	戶川芳郎	1/1	1931-
家井 真	1/1	1947-	

	佐藤 進	1/1	1947-
	野間文史	1/1	1948-
	坂田 新	1/1	1949-2009
	藤井良雄	1/1	1949-
	江口尚純	3/3	1962-

\*「篇數/人次」：篇數代表該日本學者為臺灣學者所著、譯之篇數；人次代表臺灣學者著、譯該日本學者之人次。

## 六、結 論

本文透過統計、歸納、分類、析論等方法，從各資料庫、書目中找出與本議題相關的論著，得知戰後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成果，共得六十六筆，著作三十二筆，翻譯三十四筆。就著、譯者人數而言，共有三十二人，著、譯者身分大多為學校師生，且不少有留日經驗者。

戰後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貢獻，杜正勝以翻譯白川靜《詩經研究》，並介紹白川靜的《詩經》研究方法，為臺灣學者所關注。林慶彰除翻譯外，並有著作、書評等作品，是引導臺灣學者研究日本學者太宰春臺、大田錦城等之《詩經》學，並譯介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村山吉廣教授《詩經》學的主要學者。張寶三的三篇著作，貫穿日本室町、江戶、近現代的清原宣賢、東條一堂、吉川幸次郎等三人的《詩經》學及其研究方法。林耀滂雖只有一篇〈葛蘭言、白川靜的《詩經》民俗學研究論述〉與日本《詩經》學有關，卻比杜正勝更深入地析論白川靜的《詩經》民俗學及其研究方法。洪順隆分析吉川幸次郎不採用民俗學的為學方法，為吾人提供另一種研究《詩經》的進路與思考取向。

戰後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之影響方面，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引用杜正勝翻譯的《詩經研究》（後更名《詩經的世界》）最多，總筆數為一〇五筆。且其出版量亦最多，影響層面亦最廣、最大。林慶彰有十三筆，張寶三有八筆，林耀滂六筆，洪順隆四筆。年輕輩則有金培懿、馮曉庭、田世民、楊心怡、田紓凡等，他們研究日本《詩經》學之貢獻及影響，指日可待。

戰後臺灣學者研究之日本學者共得三十二人，室町時代一人、江戶時代十二人、近現代十九人，可知臺灣學者多研究近現代日本學者的《詩經》學。江戶時代



以古學派學者居七人為多，可知臺灣學者對古學派學者有較高的興趣。以人物而言，江戶時代的太宰春臺、大田錦城，以及近現代的白川靜、吉川幸次郎、村山吉廣、江口尚純等人，臺灣學者的研究較多。究其原因乃在於太宰春臺是古學派中經學著作最豐富，對朱子學反對最力的學者。大田錦城則是江戶時期集考證學之大成的學者，其考據之目的在於明義理，此與清朝考據學略為不同。吉川幸次郎雖置身新學術風潮，卻不採用新方法，而堅循舊注、分析語言等方法。白川靜的《詩經》研究，則採用民俗學的新方法。村山吉廣以明、清時代的學者為主要研究對象。江口尚純以中國唐宋《詩經》學、日本江戶時代的《詩經》學、《詩經》學的目錄學為研究領域。

由以上的析論可以看出翻譯之作對於學術界之貢獻與影響，絕不輸給著作。楊晉龍認為：「域外相關研究」、「譯介外國論著」等等之「論著明顯偏少，甚至還有無人研究的議題」，「是爾後《詩經》研究者可以加強及開發的論題」<sup>75</sup>。但環視現今國內的學術環境，並未對從事翻譯者開出公平正義之道，除了不將其翻譯之作視為重要成果之外，也未曾給予適度的獎勵。致使國內雖有眾多具有優秀外語翻譯能力者，卻無意從事翻譯工作，這實在是國內學術界之損失。建議應比照著作之待遇，改善不完善的學術環境，以提高學者從事翻譯之意願。

七十餘年來，臺灣學者研究日本《詩經》學僅三十二人，就研究者人數而言，實在太少了。所以除須多鼓勵年輕研究者投入日本《詩經》學的研究外，更應思考降低培養經學之學齡門檻，若無新血的注入，或缺乏青年的參與，經學終將枯萎凋零。就現實面來看，除需要具備經學的知識背景外，還需要學習日本語文（現代日本語文、古典日本語文），才能從事日本《詩經》學研究，或進而從事中、日《詩經》學的比較研究。況且語言的學習需要時間及持久的毅力，因此及早培育語言人才實是當前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

<sup>75</sup> 楊晉龍：〈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1949-1989)〉，頁47。

